

民運長才劉培初

同志們閒話家常，談到戴笠先生用人，往往拿上吃飯的口味作比喻。鹹的甜的固然人人喜歡，而戴先生對於辣的苦的臭的，也照樣喜歡。於是提到某一個人，就做辣椒，比做苦瓜，比做臭豆腐。總之，不論怎樣的人，戴先生都能用。在他的心目中，天地父母生下一個人，就有他的用處，沒有不可用之才。劉培初兄在同志中是位特出的人物，與衆不同，以我和他建交來說，就是最好例證。

我和培初打交道

二十五年夏天，南京派一個視察全國的五人視察團，培初兄任團長，人事周壽之（康）兄、會計林堯民兄，情報顧子載兄，還有一位記不清楚了。視察團抵達北平的第三天，培初兄和我及站書記周世光兄三人在中山公園古柏樹下吃茶，漫談工作。我們是初次見面、第一次談話。突然他問起區書記毛萬里兄的私生活，問他和某一位女士的某些傳說。

「不知道！我沒有看見過。」培初兄對我的回答很不滿意，回頭問世光，世光說了許多，似乎很合乎培初兄的胃口，我看見他的面部表情很高興的樣子。

「我看你連話都不會講，簡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的確，我不如世光同志。」我說：「劉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來視察工作嗎？就請你下張條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對調一下。」

一位視察團長還沒有隨便調動人事的權力，我這麼一說，的確把他難住了。毛萬里兄沒有來北平以前，是戴先生的侍從機要祕書，私自發了一份電報，被劉培初拿到，告在戴先生那裏。結果毛萬里坐了一個月的牢，機要祕書也不能再幹，才派到北平區做書記。在視察團未到北平前兩個月，我忽然接到戴先生一份電報，開頭一句就有些古裏古怪：「兄乎！吾人在革命最前線……」接着責備我不應當和毛萬里鬧意見，我真不知怎麼一回事，因為我根本沒有同人家鬧過意見。

「我身為站長，說話要負責任，不能道聽途說，向一位視察團長報告沒有親眼所見的事情。」我這個連話都不會講的站長，必須說明我的理由，我說：「今天，你劉先生有三點絕對錯誤：第一、你以視察團長身份向北平站長這樣說話，跡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士可殺，不可辱，你知道嗎？第二、毛萬里是被你告倒，才調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報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裏一定認定你的氣量小，不識大體，會減低對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給我來過電報，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見，認為我和毛萬里在鬧意見。如果你根據我所說的話向戴先生報告，豈不是證實了我真的同毛萬里鬧意見嗎？所以，我絕不能向你說毛萬里半句壞話，你懂嗎？」

我說得他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他並不服氣，於是把他兩天來聽到別人攻擊我個人的資料，一股腦兒抖出來。這些不可靠的一面之辭，我拿具體事實一一駁倒了，真相大白，他沒有難倒我。那天一場論戰，無疑的得罪了一位很有權勢的欽差大人，那還了得？我不服氣他這位視察團長，絕不向他低頭，我準備捲鋪蓋，辦理移交，等着！等着沒有下文，到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北平淪陷，我還在北平，顯然，視察團回去，對我這個倔強的站長，沒有做壞的報告，可能連毛萬里的私生活也沒有報告，這就不是一個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二十八年春天，我調回後方工作。在武昌碰到培初兄，他正任總政治部的處長，對我的工作很關心，邀我到政治部工作。我自從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就下定決心，一切聽候命令，絕不自由活動，所以沒有答應。在武昌我們常常見面，他對我當做知己朋友，不同於尋常，豈非怪事。

辦工會幾乎喪命

這位出身黃埔軍校五期的劉培初，因為做事的方法不同於一般，認真踏實，好用妙着、絕技，幾乎送了性命。十七年湖北省黨部派他做紗麻絲布四局工會常務委員，到職不過一個星期，就遇上一樁很大的工潮，幾千名工人包圍了工會大樓，聲言要打倒工會，打倒工會的委員。聲勢浩大，工會的人們都翻牆逃走了。劉培初覺得他和工人們無仇無怨，有點不甘心，於是牛刀小試，換穿了一套工友的衣服，混進工人羣

衆中間，聽聽工人們講些甚麼。不聽則已，一聽才知道這羣無組織的工人是受廠主的利用。廠主不願意有工會存在，嗾使親近的工人，發起打倒工會，許多人是湊熱鬧，跟着喊叫。他們說民國十五年共產黨搞工會，把工廠搞垮，使工人們失業；後來桂系又搞工會，說工人是共產黨，殺戮了許多人，現在爲甚麼還要搞工會？

工人們越聚越多，布廠的六千工人全都停了工，紗絲麻廠的工人也都湊攏來。廠主玩火燒身，他祇知嗾使工人反對工會，却不能掌握工人，無法善後，慌了起來，打電話給保安司令部，請求派部隊來彈壓。軍隊包圍了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腦兒捉起五十多人。這時候劉培初走出人羣，對保安司令部派來指揮捉人的參謀說：「我是工會的常務委員劉培初，工人們要打的是我，我和他們毫無恩怨，不怕打，混進他們中間，聽聽他們爲甚麼要打倒工會，現在已經明白了。我現在證明，你們逮捕的五十幾位工人是無罪的，所以，請你們立刻釋放！」

「劉委員！」保安司令部的參謀說：「你敢負責保證他們無罪嗎？你敢寫一張字據嗎？」

「我敢！」劉培初說完話，立刻寫了一張條子：「工會常務委員劉培初保證被捕的五十多名工人是無罪的。」被捕的工人們立刻都釋放了。他們本來是打工會委員的，他們被軍隊逮捕，劉委員却來保證他們無罪，才能釋放，於是，劉培初立刻得到工人們的擁護。他乘這個機會，要工人們推舉五十位代表，商量善後，商量工會的所有問題。他把工人們真正組織起來，三四十人爲一組，選出一位組長。所有組長都予

以短期訓練，控制了整個紗絲麻布四局的工人。

劉培初既然掌握了所有的工人，就形成了很大的勢力。廠主們自然要拉攏他，過年給他送禮送錢，他不接受，是對的。但是國民黨辦工會和共產黨不一樣，共產黨是利用工人做工具，搞階級鬥爭。國民黨則不然，是在調處勞資糾紛，使勞資兩方都能够得到好處。劉培初不應該完全站在工人方面，和廠主成了對立，失去辦工會的本意。廠主們當然恨透他，必欲置他於死地才能甘心。於是對專殺共產黨的武漢當局胡宗鐸、陶鈞下功夫了。

「諸位有甚麼事嗎？」十八年元宵過後，一天早上四點，有人敲門，劉培初起來開門，一看情形不對，忙着詢問。

「我們是警備部的，請你到我們那裏談談。」來人這樣回答。

「有命令嗎？」劉培初明白，是來捉他的。

「有！」來人從衣袋拿出一張寫着「共黨工運首領陳道守、劉培初着即拿辦」的逮捕令，向他搖晃一下。劉培初被逮捕了，關進監牢。同牢有二十七個共產黨，他們譏笑他是一根線懸在空中辦工會的，又說他同他們合在一起是二十八宿，要一塊兒上天去。

一天早上，劉培初被綁起來帶到刑場，他眼看着一個人的腦袋被砍下來，滾在地上，血像噴泉冒上去，他昏了過去。醒來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脖子，腦袋仍在上面。原來是一次陪斬，嚇唬嚇唬他。第二天十六

個共產黨被請出去，沒有再進牢房，第三天餘下的十一個共產黨又被請出去，也沒有回到牢房，二十八宿祇留下他一宿了。

劉培初坐了一年半監牢，湖北省黨部的決議案雖然是請即日釋放他，可是却關着不放，也沒有有一位省黨部的委員曾經到監牢裏看過他。而康兆民（澤）是軍事委員會少將宣傳大隊長，在湖南工作，和他素不相識，祇聽陳道守（同時被捕，關了三個月就開釋了）談過他，在路過武漢時，特地來看他，還送他幾本書看，所以劉培初終身忘不了康兆民，出牢以後，就到宣傳隊工作。

西安事變的情報

宣傳隊結束了，劉培初經鄧文儀介紹，在漢口東方飯店和戴先生見面，他們談得很投機，戴先生立刻邀他參加工作，就留在武漢站。工作了幾個月，委員長在南昌召見他和站長周偉龍。

在南昌，戴先生約劉培初談話，他準時到達，戴先生却遲來了一個鐘頭。談完話，劉培初很不客氣地說：「戴先生！我遵照約定的時間到達，等候了一個鐘頭，戴先生才來。我希望你以後不論對任何事情，都要遵守時間。」

戴先生當時沒有甚麼表示，後來却對別人說：「劉培初對我的一點小毛病都要當面批評，對於別人，他更不會客氣了，我們正需要這種骨氣的人。」

於是劉培初成了武漢站的副站長，他能用心機，也能下功夫。一天，接到南京的命令，要在漢口法租界租一棟房子。房子租妥，但他不清楚左右鄰居的情形。他爲調查確實，裝扮成廚子，和鄰居的廚子、老媽子們交往，經過兩天，他調查了個清清楚楚。戴先生抵達漢口，對房子認爲合式，開口就問環境怎樣？劉培初立刻呈上他的調查報告，戴先生看了非常滿意。不久，劉培初成了華中四省的督察。以後又擔任視察團長，走了十四省，費時二個半月，可見戴先生對他信任到甚麼程度。

劉培初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西安事變前，共產黨和東北軍勾結的情報。因爲西安事變發生，許多妒忌戴先生的人，以爲這是最好的攻擊機會，曾有一個人氣勢汹汹地質問戴先生：「你負特務責任，保衛委員長的安全，爲甚麼讓他遭受這樣危險？必須向你清算。」

事變平息以後，戴先生曾經檢查事變以前有關西安方面的情報，都呈報了委員長，並沒有遺漏一件。據劉培初自己的記載，事變前他看軍事情報，有一天收到一件包裹，打開一看，是一本線裝舊小說《玉梨魂》，趕緊用各種藥水逐頁檢查，一個字也沒有顯現。他確信一定是件重要情報，不然爲甚麼寄這樣一本書？又把書拆開，再檢查一遍，才發現是通訊員東北軍六十七軍王以哲的衛隊連副連長張華先的報告。張華先是一位愛國青年，半年前到中央軍校受訓，經劉培初選拔參加工作的。

張華先報告，張學良率東北軍到西北剿匪，王以哲的六十七軍一連打了兩次敗仗，非常氣餒，共產黨要求派代表到延安和他談談。王以哲覺得繼續打下去，毫無把握，不妨談談，看看共產黨講些甚麼。共產

黨代表秦邦憲鼓如簧之舌，對王以哲說：「東北軍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回東北去。現在派到西北來打仗，是要把東北的這點力量和西北的共產黨的力量對消。這是一條政治上的毒計，爲甚麼東北將領不明白？」王以哲居然被秦邦憲的這一番話打動了軟弱的心，共產黨勝利了，收到預期的效果。秦邦憲回去以後，第二天就把所俘虜的東北軍，連人帶槍送回六十七軍。共產黨對這批俘虜特別優待，又經過一番洗腦，放回以後，無形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員。東北軍把甜言密語的敵人當做朋友，約定以後東北軍奉命進剿何處，先通知共產黨撤退，不再認真打仗。王以哲把和共產黨接洽的經過報告張學良，他也派代表團和共產黨談判，共產黨熱烈歡迎。

劉培初覺得情況嚴重，趕緊到雞鵝巷去問戴先生：「張漢卿這種行爲，戴先生是否報告過委員長？」「你趕快回去騰好報告，我親自送呈委員長。」戴先生說。

所以劉培初拿着玉梨魂去找那位要清算戴先生的同學，告訴他，他要清算戴先生，是錯誤的。

和毛人鳳鬧翻了

三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初，劉培初担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那時祕書室還沒有主任，一天潘其武發起簽名擁護毛人鳳先生爲主任，劉培初說：「用人的權力操在戴先生手裏，別人不能侵犯，軍統局還沒有聯名干涉人事的先例呢！」拒絕簽署。

但是毛人鳳先生終於因潘其武擁護做了主任，而且提拔潘其武做了副主任，劉啓瑞也是祕書，就很不服氣這件事（親自對我說過）。戴先生自己很重視督察工作，祕書室則覺得督察室是監察機構，對行政的

首腦部門秘書室多少有點威脅，多少有些討厭，總想讓督察室離開羅家灣，遠離秘書室。而劉、毛又因主任秘密問題，有些隔閡，於是因督察室選出羅家灣的問題起了衝突，互相拍桌對吵。劉培初搬上行行李到禁閉室，向戴先生辭職，不准辭職，就不離開禁閉室，戴先生祇好照准了。

我繼劉培初任督察室主任，秘書室又藉口敵機轟炸疏散，要督察室搬到海關巷，我沒有反對，而且非常贊成，很快搬走。羅家灣的防空洞非常堅固，曾中過一次炸彈，毫無影響。防空洞雖好，沒有人管理，頂上漏下的水把兩排橈子都打濕了，不好坐人。一拉警報，各單位的公文箱子亂堆，又把路都堵塞，因此一有警報，高級一些人員都去財政部防空洞躲避，一般同志則擁在洞口，非常危險。因為督察主任兼防護團的糾察隊長，責任有關，我雖發現防空洞的毛病所在，既無權指揮別人，祇有督察室自己幹了。每天早上上班，我們督察室的四五個人每人拿一塊乾布，走進防空洞，把兩排固定的橈子擦乾淨，可以坐人。一拉警報，派兩位同志到防空洞，指揮各單位的工友把公文箱放在指定的叉道裏，不准妨礙交通。緊急警報發出以後，所有的同志必須全部走進防空洞，一個也不准留在外面，我在最後才走進去。因為自己的防空洞整理好了，那些過去到財政部躲警報的，現在也駕臨自己的防空洞了。

督察室搬離羅家灣以後，防空洞恢復舊觀，橈子濕的不能坐，公文箱子亂堆，阻塞通路，容量自然減少，也沒有人維持秩序。這時候要求督察室搬走的秘書室，覺得督察室有用了，毛人鳳先生要我們再搬回羅家灣，我婉辭了。因為秘書室無權命令督察室，我也無義務遵從他的指揮，用不着當面衝突，這就是我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一七四

和劉培初不同的地方。

二十九年十一月，我調太行山工作，培初兄調恩施第六戰區工作，戴先生在曾家岩爲我們兩人餞行，戴先生說：「你們兩位都是很悲觀的。」



「我並不悲觀！」連戴先生都以爲我同劉培初的態度相同，戴先生對我否認，沒有甚麼表示。我繼續說：「戴先生，你不能把不滿現狀，或疾惡如仇，就說成悲觀。在我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情，我一定要把他做好，絕不消極，從來不悲觀。」

擅長民運，認真踏實的劉培初先生遺照。

治錯誤，我則採取防範於未然；着重獎善，減少懲惡。無論如何，劉培初在軍統局總算是一位不平常的人。

經我這麼一說，戴先生把矛頭指向培初，數說他某些短處。的確，我和培初兄處理問題的態度和方法絕對不同，我沒有他那麼高明，沒有他那股勇氣。不過我反對用「奇」，我主張一切用「誠」。就以我們做督察室主任而言，他注重懲